

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

厦门大学历史系 杨际平

一、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政策

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占田一直采取限制政策。这一政策承之于唐朝,并延至元朝。根据唐令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修订的日本《养老令·田令》第35条规定:“凡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园地舍施及卖易与寺”^①。此条规定应本于《唐田令》,原文应为“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为《唐令·田令》的第31条^②。

《唐令·田令》所规定的官民应受田额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意在抑制土地兼并。《唐令·田令》第31条所规定的僧尼道士的应受田额:“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与第31条规定的“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其意自然亦在抑制寺观兼并土地。

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唐令·田令》的多数条款自然失效,入宋以后,更是如此。但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却仍旧行用不替。1999年戴建国先生于天一阁发现的明钞本《天圣令·田令》第3条即为“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③。明钞本《天圣令》现存10卷,自“《田令》卷第二十一”至“《杂令》卷第三十”。《天圣令·田令》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凡7条,其后曰:“右并因旧文以

^① 日本《令集解》,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八年(1983)版。《唐令·田令》的规定应既包括“寺”,也包括“观”,而《养老令·田令》则只讲“寺”不讲“观”,此或根据日本实际情况所做的修订。此外,在文字上也有一些小变动。

^② 有关《唐令·田令》的复原依据与排序,参看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有关《天圣令》的发现经过,可参看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新制参定”；第二部分凡 49 条，其后曰：“右令不行”。《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医疾令》、《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杂令》等也都分为“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与“右令不行”两个部分，与《宋会要辑稿·刑法·格式》所说：天圣七年（1029）“五月十八日详定编敕所止（按：“止”为“上”之误）删修令三十卷。……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①正同。这既表明自宋初起，便有禁止寺观市民田的规定^②，同时也印证了“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乃《唐令》“旧文”。

天圣七年（1029）以前，此项禁令已在行用，还有许多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1024）七月条载：“初，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相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去世，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钱，令市田，院僧之所以不敢受，就是因为此前已有不许寺院市民田的成法，本路转运使称此法令为“旧制”，也说明此前很久便有此“定制”。又如仁宗天圣四年（1026）六月辛惟庆从福州处置官田还，谈及出卖官田时特别指出：“又按佃户名亦有僧户。元条：僧人不得买田。已牒州出榜告示，详本主收买”^③。辛惟庆所说的“元条”无疑也是指此前的“定制”。南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四《书·罪言》言：“悠悠视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则是祖宗法不行致之也。请言其一二，而其它可举矣。寺观不许典买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无禁止，田入寺观，岂得复为民物。今寺观寔富，民田寔少，向之有田者，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监司州郡能守此法则无此弊矣”。陈造称“寺观不许典买田宅”为“祖宗法”，也说明此法自宋初以来就一直存在。宋人援引法律规定谈寺观市民田问题时，都是十分含糊地说“旧制”、“元条”、“旧例”，而不确指具体年代，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有关寺观不得市民田的规定，是自前代一直沿用下来的成规，不是宋代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 1 之 4。

^② 宋初令、式多用唐令、式旧文，既然《天圣令·田令》原封不动保留《唐令·田令》关于禁止寺观市民田的规定，此前的《淳化令》与《建隆编敕》、《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等等，论理亦应保留该条款。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 1 之 23。

某年的创制。

元丰年间（1078—1086），宋神宗又修成《元丰令》50卷，取代《天圣令》。元丰以后，还修过许多《令》。《元丰令》等今皆不存，其内容已难得其详，但从南宋时仍有人称“僧寺毋辄与民质产，令也”^①，“寺观不许典卖田宅，法也”^②等看，“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一直没有废除。及至元代，仍是如此。元人欧阳玄《分宜县学复田记》就谈到：“国家近年田令，民间田宅，僧道不得为邻。不为邻者，不使买民产也。后至元以来，又著僧道买田之禁”^③。《元典章》卷一九《户部》“卖业寺观不为邻”条即载：“至元六年三月尚书省来呈：济南路延安院张广金告段孔目将相邻本院田产卖与杨官人为主。照得田例：‘官人百姓不得将奴婢、田宅舍施、典卖与寺观。违者，价钱没官，田宅、奴婢还主。’其张广金虽是地邻，不合批问成交。得此，本部设得，即今别无定例，如准前拟，似为相应。呈奉都堂准呈札付释教总摄所施行”^④。其中所称引的“田例”，与《唐令·田令》第31条、《天圣令·田令》第3条相比较，只做很小改动。由此可见，自唐朝至宋元，都有“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的规定。宋天圣七年以后，对此禁令是否有过变通的规定，还不清楚。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31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七月二十三日臣僚言：‘私荒田，法听典卖与观寺。多以膏腴田土指作荒废。官司不察，而民田水旱，岁一不登，人力不继，即至荒废。观寺得之，无复更入民间，为农者受其弊。欲除官荒田许观寺请佃外，余并不许典卖’。从之”^⑤。游彪先生据此认为：至少在政和元年以前，“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私有的荒田可以卖给寺院、道观”^⑥。其说值得重视，但还不能确定，天圣七年后，政和元年前，是明文规定私有荒田可以卖给寺观呢，还是上述臣僚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令文中推论

^①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九《明州育王山买田记》。

^②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四《罪言》。

^③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六《分宜县学复田记》。

^④ 《元典章》，光绪戊申法律馆刻本。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31。

^⑥ 游彪《宋代“禁寺、观毋市田”新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四期。

出私荒田不在其列。两宋政府始终实行鼓励民户（主要是客户与下等户）请射耕垦荒田的政策。无以自存的寺观请射耕垦荒田，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会被允许。游彪先生又推论：有了私有的荒田可以卖给寺院、道观的规定，“普通百姓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便很有可能被迫让耕地抛荒，此时寺观便可以买了”。笔者以为此说虽有道理，但不一定符合当时实际。因为宋朝政府在处理土地的产权关系时，暂时抛荒的土地是不包括在“荒田”之列的。宋代的赋役大都落在土地上，普通百姓如果让土地抛荒而不承税，其土地就很可能被没官，从而成为没官田；如果普通百姓迫不得已让土地抛荒，而仍承担赋役，那么，其所抛荒的土地仍旧是民户税田；如果普通百姓被迫抛井离乡，那么，其田土就成了逃户田。按法令规定，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寺观都不能合法地典买。

元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六《分宜县学复田记》：“昔前宋咸淳癸酉（1273），分宜民曰宋应槐，讼其乡有田，称梁子思所置，立户为万寿庵长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伪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买民业。冲违法私买，妄称梁氏所置，故应槐发之。漕使钟某阅实，据法罪冲等，而没其田，以畀分宜县学养士，士刻石为记”。游彪先生据此认定，“宋朝土地法明文规定没有常住田产的寺院可以合法地买入百姓田产”。我以为，如果元人欧阳玄引宋田令准确无误，确实可以由此引申出没有常住田产的寺院可以买民业的结论，但规定“寺已有常住田，不得买民业”与明文规定没有常住田产的寺院可以买民业，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明文规定没有常住田产的寺院可以买民业，那就一定还要同时规定各个寺院人均可以置田的最高限额，否则就很难操作，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未见宋代有这一规定^①。这里之所以提出元人欧阳玄引宋令是否准确的问题，是因为时人引宋令，有时并非原原本本地引述令文。如唐宋户令规定：“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②。但刘克庄在其《女婿不应中分妻家财产》判文中却称：“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③。

^① 本文的一些看法虽与游彪先生上引文不尽相同，但所受启发实大，于此特致谢意。

^② 《宋刑统》卷一二《户婚律》引。原注省略。

^③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又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鄱阳县东尉检校周丙家财产事》。

刘克庄所称引的令文，与宋代的实际规定，就相差甚远。但不管宋朝政府对于寺观买田的规定是否曾经做过变通，“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这一基本原则始终不曾改变。至于它是否被认真执行，那是另一回事。

从现有资料看，官人百姓将田产施舍或卖易给寺观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如：

《成都文类》卷三九，政和七年（1117）杨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记》：“建隆（960～963）中，王师西征，蜀之君臣^{〔y1〕}天威不违咫尺，自知灵诛之不可追也，惶怖稽首，愿奉土地以献，举其孥入受廛比编氓，有诏俞许。命诸将振旅，独以降王北还。……时伪节度使田钦全与其夫人郭氏谋所以饰喜而效报者，尽捐所有土田施诸正法寺。……以今量法步之，周袤度可为田万亩以上”。

批注〔y1〕：此字可简化为“亦”，下“目”。音

《金石续编》卷一三《广慈禅院庄地碑》记：天福六年，晋昌军节度使安审琦于“庄宅营田务请射到”万年县春明门陈知温庄与泾阳临泾教坊庄、孙藏用庄、王思让庄，“依例纳夏秋省租”。淳化二年（991）瀛州防御使、检校太保、知雄州安守忠将其中之永兴军万年县春明门的陈知温庄壹所并^{〔y2〕}所与泾阳县界临泾庄壹所，“两处田土庄舍并舍与广慈院内，永充常住”。据计算，此两庄共有田土 57 顷 70 亩。

批注〔y2〕：此字音 wei，“石”，右“岂”。

《金石续编》卷一三四《传应法师行状》记：“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命起居舍人王龟从、内供奉王守节赴终南山慎选胜基，构立上清太平宫”。其后，“法师前后锡赍，咸贾易创田园，不啻万亩，立为常住”。

《金石续编》卷一四，天圣八年（1030）八月二十五日《大宋京兆府郾县逍遥栖禅寺新修逍遥水磨记》：“寺之东南隅三里已来，案图经曰高观之谷。其谷口有隙地，先是尚行温之地，乃前寺主崇恩端拱（988～989）中以金帛易之”。

《金石续编》卷一三，宋咸平六年（1003）《重真寺田庄记》：“志谦家本邠州，俗姓杨氏”，先师庵化后，主持该寺“五十余秋”，“与师兄志永、师弟志元，辍那衣钵，去寺北隅置买土田四顷有余。又于西南五里已来有水磨一所及沿渠田地”。共有地 420 多亩。

（杭州）《灵隐寺志》卷二记：“宋天圣三年（1025），皇太后赐钱买田数：一、收买杭州钱塘县林田土五顷；一、盐官县思亭乡水田一千顷；一、秀州崇德县积善乡水田一千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神宗熙宁八年（1075）四月条，“司农寺言：州县百姓多舍施典卖田宅与寺观，假托官员姓名”。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四三《札子·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臣相次用所得禄赐，及蒙恩赐雩银，置到江寧府上元县荒熟田。元契共纳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二领、小麦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钞二十四贯一百六十二文省，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为臣父母及雩营办功德。欲望圣慈特许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遂追荐，昧冒天威，无任祈恩屏营之至。取进止”。

批注 [y3]: 此字上“廿”
“废”。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九《明州育王山买田记》：“绍兴元年（1131），高皇帝行幸会稽，诏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上仁宗皇帝赐僧怀琬诗颂亲札，念无以镇名山，慰众志，乃书佛顶光明之塔以赐，又申以手诏，特许买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诏。佛照禅师德光，以大宗师自灵隱归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辄与民质产，令也。今特许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灵隱时，寿皇圣帝召入禁闕，顾问佛法，屡赐金钱，其敢为他费。乃尽以所赐，及大臣长者居士修供之物买田，歲入谷五千石，而遣学者义铎求记于陆某”。

《金石萃编》卷一四九，江苏昆山《淀山普光王寺舍田碑》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 日承节郎沈从言疏：“二月十六日恭值先妣太君朱氏远讳之辰，特发诚心，谨将本家产田貳伯肆亩一角三十步，其田系在秀州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三都，坐落、所有（“有”疑当为“至”）、丘片、字号、谓（“谓”疑当为“位”）段，并在契约该说，其田今将舍入淀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

王厚孙、徐亮《至正四明续志》载淳熙八年（1181）戴机《蓬莱观轮藏记》：“邑檀那保义郎厉斌”参与修轮藏，“又乐舍良田百亩”。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八《能仁寺舍田记》：“淳熙十三年（1187）三月乙巳，承节郎河东薛纯一诣绍兴府，自言生长太平，蒙被德泽，念亡益县官，不胜悽悽报国之心。愿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歲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禅寺”。

《两浙金石志》卷一〇《宋广寿慧云禅寺碑》：“绍兴元年（1190）春 月辛丑，故循王之曾孙、宣义郎、直秘阁、前通判临安军张鉉请于朝曰：愿以城东北新宅一区，效前

贤舍为佛寺，仍割田六十顷有奇贍其徒”。

《江苏金石志》卷一四《慧日禅院公据》：嘉泰元年（1201）“今堂头和尚祖印募到檀越樊承事一力备钱置到诸乡苗田，计得租米贰百硕入本院。并本院元有度僧田五十一硕，共凑贰百五十硕入本院”。

《江苏金石志》卷一四，嘉泰元年（1201）《上方教院募到檀越舍田名衔》：“伏承光福市东弟子陈三公名蕴，同妻朱氏妙智，发心施财置到田地，共租米口十口硕充常住”。

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七七《寺院·崇福院》记文：李秀岩心传记：“龙山崇福禅寺者，绍定壬辰（1232）开山僧宗明所创也，在杭都之南，浙江之上。郭璞所谓龙蟠凤舞，指其地也。建炎以后，自川陕荆湖闽广陆道入京者，皆渡涛江而来，由西兴抵龙山最为冲要，而傍江东西曾无次舍之地，行者病焉。明虽方外士而慨然有济人利物之心。前是十年，首建明化寺于西兴，以为延待往来之所。及是又创于龙山，已而，浸至衢、建、泉、福、南剑诸州，为寺者二，为院者四，为庵者二十有三。起衢逮剑，凡山溪之险峻皆平治之，买田种山以贍守者，俾祁寒暑雨之际，倦思憩渴思饮者，各有所之，盖其所接纳行道之人咸及焉，匪及缁黄而已。既又推其所为，病者有药，死者有竈，厥惠浸广，人多称之。合庵寺供给之所资，田之以亩计者二千有七百，园林之在山而以亩计者千有六百，稻米之以秤若斛计者四百，盖以子本之钱岁入有差。皆明衣钵之所自营，未尝求诸外也”。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七《寺院》记寿圣接待寺引黄震寺记称：该寺“起宝祐甲寅（1254），积十年而成屋数百楹，……乃买田吴门千亩，买山朱桥数百亩”。

同书同卷《南高峰荣国寺》记：“天福间建，元系塔院，奉白龙王祠，宝佑五年福王捐施重修，请富阳废寺额，咸淳六年（1270）安抚潜说友创造，……又买官田二百亩为僧供”。

宫兆麟《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四《建置·寺观》称：“上生寺，在延寿里，唐大顺元年校书郎黄璞舍地为寺，寺内原有黄璞祠堂。宋银青大夫阙下林讽子、吏部郎中攸积舍田二百六十余亩，又舍园地麦豆租三十石种，并入本寺”。

宋代寺院中占田最多的，应是明州的几个大寺院，。李心传撰《建炎杂记甲集》卷一

六《财赋·僧寺常住田》说：“今明州育王、临安径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数万亩”，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四明寺》也说：“四明僧庐在六邑总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县城内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仆称是。天童岁收谷三万五千斛，育王三万斛”。李心传与刘昌诗的说法都有些夸张，据《宝庆四明志》卷一一《叙祠·寺院》记载，明州鄞县阿育王山广利寺有常住田 3895 亩，山 12050 亩；天童山景德寺，有常住田 3284 亩，山 18950 亩^①。寺院田产规模之大，也确实惊人。

按地区计，福建地区寺院占田的总数与比例都最大。据《淳熙三山志》卷一 0《版籍·垦田》记载：福州地区，垦田 42633.18 顷，其中寺观田 7324.46 顷，占总数 17%。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 62588.51 顷，其中寺观 15800.59 顷，占总数 25%。因而，时人林希逸曾形容：“吾乡地狭人稠，田之大半皆入诸寺”^②。淳熙年间，福州地区主、客户共 321234 户，以户均 5 口计，主客口约 160 万，平均每口占“田”约 2.7 亩；占“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约 4 亩。时福州地区僧尼、童行计 14445 人，人均占“田”约 51 亩，约为民户人均占田的 19 倍；占“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约 109 亩，也为民户人均所占 27 倍。福州如此，漳州更甚，龙溪人陈淳《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书》说“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无担石之家终岁营营为仰事俯育之计，且不能以自给。……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③。韩元吉也说：“夫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为美，而佛之庐几甲于天下”^④。

上举诸例中，王安石舍田给蒋山太平兴国寺，与张鎡舍田给广寿慧云禅寺两例，经过朝廷特许，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买田，曾经宋仁宗特许，杭州灵隐寺的买田用的是皇太后的赐钱，应该也经过朝廷特许，田钦全与安守忠的舍田，可能也已请于朝，都

^① 据《宝庆四明志》卷一一《叙祠·寺院》记载统计，整个明州地区寺院共有常住田 689.76 顷，山地 2808.96 亩。

^②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 0《重建斂石寺记》。

^③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三《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

^④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建宁府开元禅寺戒坛记》。

不算违法置产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置田数目巨大，超出僧尼供食之需，而且都明明白白写明是舍田或买田，而不是垦辟荒山、荒田，应都属于违法市民田范畴。寺观市民田现象的大量、公开存在，说明宋代寺观不得市民田的规定，总体上讲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但这不等于说，宋代有关寺观市民田的禁令，都是一纸空文。事实上，以此为意的官吏也不乏其人。除上引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金，令市田，受到本路转运使的抵制，天圣四年（1026）辛惟庆处置福州官田时说“元条：僧人不得买田”，明道二年（1033）殿中侍御史段少连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①等外，《宋史》卷二九八《陈希亮传》亦载：陈希亮，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初为大理评事、知长沙县。有僧海印国师，出入章献皇后家，与诸贵人交通，恃势据民地，人莫敢正视。希亮捕治置诸法，一县大耸”；《宋史》卷三三三《李兑传附从弟先传》亦载：仁宗朝，李先任淮南转运使，“寿春民陈氏施僧田，其后贫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园中笋，遂执以为盗。先诘其由，夺田之半以还之”。陈希亮、李先这么做，其政策依据也可能即是禁寺观买民田，或接受施舍民田。

南宋时期，仍不断有人据此禁令处置寺观田产，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就有臣僚建议“其州县寺观于图经内各有所载去处。近来僧道往往于所在去处擅置庵院，散在民间，若无敕额，其所置田产屋宇亦依前项施行（按指将寺观绝产拨充赡学支用）”^②。

绍兴二十二年（1152），朝廷派司农丞钟世明到福建措置寺观财产。“世明措置，将寺观田产除二税、常住岁用等外，每岁趲剩钱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六贯八百四十五文，起发赴左藏库”^③。钟世明的办法虽然不是没收寺院多占的土地，但其实际效果已接近于剥夺寺观多余土地。

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江南东路转运叶义问言：欲望将今日以后应拘没到僧道置产及寺观绝产并行措置，如召人实封投状增钱承买，起理二税。从之”^④。

^①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 61 之 15。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 61 之 15。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 5 之 27。

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二十八日，知温州黄仁荣言：因经界出僧道违法田产，即合照应见行条法，拘没入官。欲乞将上件拘没田产，尽行召人实封投状出卖给价高之人。仍旧令投纳牙契，供输税苗，公私两便。内如有卖未售之田，合行权给租课，亦乞先给见租种人组租送纳。……从之”^①。此两例，前者包括处置“僧道置产”问题，后者则完全是处置“僧道违法田产”，要言之，都是在执行寺观不得买民田与接受舍田的禁令。

《宋史》卷四三三《程大昌传》载：南宋孝宗朝，程大昌任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程大昌在反对给六和塔免科徭时，也提到了“僧寺违法置田”问题。

上述资料又都说明，宋代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禁令的实施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虽然总体上讲未严格执行，但并不都是一纸空文。

二、宋朝对寺观的赋役政策

唐宋时期，赋役制度产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关联，政府对寺观的赋役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前期主要是实行租、调、庸（或正役）制。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征收租庸调的根据是州县乡里的户籍。唐前期赋役令关于免课役的条款很多，其中并未见僧道免课役的规定^②。但唐前期僧人获度牒正式出家后，总是要先除州县乡里户籍，而入寺院僧籍。州县户籍归户部掌管，户部主要是管赋役；僧尼籍先后归司宾、祠部、主客等部门掌管，司宾、祠部、主客等部门都不管赋役。虽然《唐令·赋役令》并未规定僧道可以免租庸调，但实际上都因其脱离了州县户籍，因而都免了租庸调。

唐前期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税与地税。户税按户等征收，地税据地征收，王公百官都要交，寺观自然也能不例外。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僧道也因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5之27。

^② 参见《通典》卷七《丁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与戴建国《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文史》2000年第四辑、2001年第一辑）所录部分唐令旧文。

此丧失了免租调役的特权。

宋代继续实行两税法，僧道仍旧要承赋役。《天圣令·赋役令》即规定：

“诸户役，回任官应免者，验告身灼然实者，注免。其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皆准此。自余者不合。

诸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具状以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色役。有精诚冥感者，别加优赏。

皇宗籍属宗正者，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本服缌麻以上亲，皇太子妃本服大功以上亲，亲王妃及内命妇一品本服期以上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并免色役^①。

僧道与上述三条皆不合，自然不在免课役范围之列。天圣以后庆元以前所修的敕令格式对于僧道承赋役问题是否有明文规定，不详。现存《庆元条法事类》残卷，有关寺观承赋役的规定有以下4条：

“赋役令：诸州僧道免丁钱，上半年限至八月终，下半年限至次年二月起发赴左藏库送纳。仍于限内开具等第人数、所收数目帐状，供申提点刑狱司及尚书户部”^②。

“诸寺观（原注：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③。

“诸寺观（原注：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④。

“诸寺观（原注：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夫役（夫役谓科差丁夫役使）、免役钱及诸色科敷。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⑤。

如果说《天圣令·赋役令》只是间接显示寺观僧道并无免赋役特权的话，那么，《庆元条法事类》残卷所见的以上4条就直接证明了寺观僧道承赋役同于一般编户，并无免赋役特权。下面再结合具体史实分析宋朝政府对寺观赋役政策的执行情况。

^① 戴建国《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文史》2000年第四辑、2001年第一辑。

^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门·点磨隐陷》。

^③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赋役门·受纳税租》。

^④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赋役门·支移折变》。

^⑤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赋役门·科敷》。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五《祠祀志·天庆观》记：该观“本朝大中祥符间赐额，改为祥符宫，续又改为天庆观。绍兴十七年重建。淳佑初重修。太学正章公权为之记。记云：……金陵之天庆盖晋冶城故地，杨氏之吴建为紫极宫，籍田二十顷在常之晋陵无锡间。暨为天庆，田亦因之，熙宁间始敕免税役”，说明熙宁（1068～107）以前，寺观已经既有“税”，又有“役”。上引杨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记》：建隆（960～963）中，王师西征，蜀中节度使田钦全降宋，“尽捐所有土田施诸正法寺”，其田土经过多年垦辟，至庆历、元丰年间成田 7000 多亩，然多被佃户侵占，后来又被籍入官。后经长僧德信力争，柄笔宰执鲁国公“言于上，悉以田归寺”，时为崇宁四年（1105）四月。政和七年四月初三日《正法院常住田记》称“凡田之赋役，公有版籍”。《宋史》卷四二六《循吏·张逸传》载：仁宗朝，张逸任开封知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执不许。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从之。”《两浙金石志》卷九《桐柏崇道观尚书省帖碑》称：“本部已检坐隆兴元年（1164）指挥，臣僚上言：江浙之间寺院物力与民间物力袞同一例科敷”。只是因为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建造徽宗皇帝本命宝殿，应朝拜崇奉”，所以特免科敷。尚书省帖还特别申明，“其余不得援例”。《宋史》卷四三三《程大昌传》载：孝宗朝，程大昌任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时“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程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其事遂寝。这些事例都说明宋代寺观田除了违法隐瞒田产者外，实际上也是上了国家版籍，并承担“赋役”。

《宋会要辑稿》食货 12 之 16 载乾道元年（1165）四月四日诏：“僧道年六十以上，并笃疾、残疾之人，并比附民丁放纳丁钱。自乾道元年为始，仍令州县出榜晓谕”。说明此前六十以上民丁与笃疾、残疾民丁可以“放纳丁钱”，而六十以上僧道及笃疾、残疾僧道反而不能“放纳丁钱”。乾道元年以后，六十以上僧道及笃疾、残疾僧道才获得“比附民丁放纳丁钱”的权利。

《金石萃编》卷一三四《重修仙鹤观实录》记偃师缙氏镇郭下安品素“舍地基二十八亩三分”给仙鹤观时，特别附加一笔：“系正税绢七尺。外别无青苗税数，亦无官私地课”。陆游《能仁寺舍田记》记述淳熙十三年（1187）薛纯一舍田事迹之后也郑重说明：

“田之顷亩、赋役，及别以钱权其子本，以待凶歲，则具书于碑阴，俾后有考焉”^①。这都表明，民户将民田舍与或卖与寺观时，必须随之要过割随田“赋税”，就象民户之间的产权转移一样。

寺观田中有一部分是赐田。赐田中，有的免赋役，有的不免。如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记：元真观“在礼部贡院西，唐中宗景龙二年建，遂以景龙名。后唐改中兴观，钱氏改钱明宫。国朝雍熙二年改元真观，大中祥符二年为天庆观，天禧三年守王右相钦若奏徙天庆额于真圣观，而复元真之旧。赐田凡五百亩”^②。开宝仁王寺，寺“在七宝山，先是东京开宝寺，有仁王院僧慧照大法师晬随驾南渡，绍兴五年奏请权建于七宝山，主大内祈禳事。绍兴三年始赐勅额，嘉泰甲子、绍定辛卯一再毁，僧祖仁重建。端平元年，尚方铸钟以赐。淳佑元年，御书寺额以赐。三年，赐田三顷。景定五年又毁，太傅平章贾魏公施度牒给省札市村口重建”^③。这两个观寺的“赐田”就没有免赋役。

多数寺观的部分蠲免赋役可能与赐田同时进行，如《灵隐寺志》记天圣二年（1025），皇太后赐灵隐寺钱买田二千多顷，“并免秋粮夏税”，与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记载的县西南一十八里洞霄宫，“国朝大中祥符五年（1012），漕臣陈文惠公尧佐以三异奏，赐额为洞霄宫。仍赐田十五顷，复其赋”^④，在宰执府的天庆观，“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旨重建，赐田五百亩，除其赋”^⑤，在小麦岭的旌德显庆寺，“理宗（1224～1264）皇帝益买田以赐，凡三千亩有奇。圣上为尽复其赋”^⑥，《金石萃编》卷一四七《拱极观记》所记的华阴拱极观，“（徽宗）重和元年（1118）冬，诏使王仍来降御香……奉圣旨拨赐岳庙旧田伍顷，特免二税，充斋粮”，以及袁燮《绍兴报恩光孝四莊记》所说的会稽郡城东南的报恩光孝寺，宋高宗时“赐田十顷，科徭悉蠲”^⑦，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有的寺观的部分蠲免赋役则在赐田之后一段时间，如在临安报恩坊的报恩光孝观，据记载乃清泰四年（937）钱氏所建，原号开元宫。宋景德四年（1007）改景德观。崇宁

^①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八《能仁寺舍田记》。

^②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元真观》。

^③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六《寺观·开宝仁王寺》。

^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洞霄宫》。

^⑤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天庆观》。

^⑥《咸淳临安志》卷七八《寺观·旌德显庆寺》。

^⑦袁燮《絜斋集》卷一〇《绍兴报恩光孝四莊记》。

二年（1103）改崇宁万寿观，赐盐官县田一千亩，政和三年（1113）改天宁万寿观，建徽宗皇帝本命殿。绍兴七年（1137）改报恩广孝观，十三年改赐报恩光孝观额，专以追崇徽宗皇帝香火。绍定三年（1230）得旨蠲其赋”。该观从崇宁二年获“赐盐官县田一千亩”，到绍定三年“得旨蠲其赋”，隔了120多年^①。又如临安涌金门外的灵芝崇福寺，太平兴国元年（976）建。大中祥符（1008～1016）初，赐灵芝崇福寺额。“绍定（1228～1233）间，朝廷给田七百亩，咸淳二年（1266）太傅平章贾魏公为蠲和役”^②。从赐田到“蠲和役”，也隔了60多年。

寺观“赐田”的蠲免赋役，需要得到朝廷的特许。即如建炎元年（1127），知越州翟汝文奏所说“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③，和李心传所说“今明州育王、临安径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数万亩，其间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④。上引天圣二年，皇太后给杭州灵隐寺赐田，赐田后灵隐寺即向朝廷申请放免两税，得到朝廷的同意，灵隐寺便将天圣八年中书门下所下的牒文刻石为志，牒文称：“……太后圣旨宣赐庄田……其田上见今供纳秋夏二税……系属杭州、秀州两处乡县，乞与放免上件税物。……牒奉敕宣令逐州子细勘会，如委实是宣赐到庄田，据合纳夏秋二税并与放免。即不得将不系宣赐到田土内税物一例放免。牒至准敕，故牒。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六日牒”^⑤。

台州的白云昌寿观和台州桐柏崇道观也是如此，乾道五年（1165）五月二十五日，白云庵奉“圣旨”，“专一崇奉皇帝本命香火，以白云昌寿观为名。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义兴、土臼、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亩，并拨充本庵常住，在上租税，依崇道观例施行”。事后，白云昌寿观亦将朝廷敕牒刻石为志^⑥。桐柏崇道观同样也将该观“特免科敷”的尚书省帖刻碑为志^⑦。

以上事实表明，宋代寺观“赐田”的免赋役，须经中央政权特许，而终获得免赋役特许的，只是赐田的一部分；地方政权无权蠲免寺观赋役。庆元（1195～1200）年间，《庆

^①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报恩光孝观》。

^②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寺观·灵芝崇福寺》。

^③《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布帛》。

^④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一六《财赋·僧寺常住田》。

^⑤《两浙金石志》卷五《灵隐寺中书门下牒碑》。

^⑥《两浙金石志》卷九《白云昌寿观敕牒碑》。时崇道观之例是“将每岁租课拘收支拨供赡斋粮”。

^⑦《两浙金石志》卷九《桐柏崇道观尚书省帖碑》。

元条法事类》曾规定寺观田土，“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也不得免税租、支移折变、夫役、免役钱及诸色科敷等，然从咸淳十年（1274），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邸第威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①的情况看，此类规定似难严格执行。但一般寺观与民户一样承担赋役的政策，应被严格执行。

上面说过，宋代福建的寺院占田甚多，所以它承担的赋役也很重。南宋林希逸就说过：“吾闽之人衣食其田，自二税之外无所与闻。问之僧寺，则上供有银，大礼有银，免丁又有银，岁赋则有祠牒贴助，秋苗则有白米撮借，与夫官府百需，靡细靡大，皆计产科之。……故前辈有曰：僧寺，闽南之保障”^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版籍》也说，“故州常赋外一切取給於僧寺”^③。当然，福建寺院的赋役负担，与其财产（主要是田产）状况是相称的，与民户相比较，并不算畸重。

综观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朝政府之所以和唐朝一样禁止寺观市民田与接受施舍民田，其动因乃在于抑制寺院兼并土地，而与赋役制度无直接关系。

杨际平 2003. 6. 23(刊于《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出版)

存留资料：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何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无担石之家终岁营营为仰事俯育之计，且不能以自给。……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以灭伦败教不耕不蚕块然一无用之僧，独无故窃据而奄有之，闲居以安享之，所与坐食之众，上寺不过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数十人，其下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则岁费类皆不能十之一，所谓九分者，直不过恣为主僧花酒不肖之资，是果何为也哉。

故今公家凡有创造，无求诸他，惟尽第彼僧门产业之高下，而画吾屋宇界分之大小之财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财为之开端，而后取办责成焉耳，绝无出一引，绝无差一吏，凡竹木砖瓦之类，任其以市价私自贸易，而吾不之问焉，则其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

^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

^②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〇《重建斂石寺记》。

^③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版籍》。

夫之輩听其以乡例私自佣雇，而吾不之绳焉，则其所就者皆固致。假使有陪贴不贲之费，实皆吾公家之财也，移吾公家之财，为吾公家之用，彼特为吾干之耳，非克彼父母钱本也，非括彼房奁中物也，吾不可复为之恤也，但时施其犒劳之惠耳，若是，则吾民不知扰，吾财不甚费，而无不如吾志之所欲为。往者，判院赵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责办于诸僧，而民绝无所扰。即今之厅事是也。司谏邓侯之架州学，亦大役也，每斋惟支百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学成，即前所谓西偏是也。都运赵侯之造通济桥，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桥成。即今柳营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诸名公盖有高识明见，烛破风土民俗，轻重弛张之所宜，而随宜区处，所以为至当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为如何某素不预学校教養又已该恩免不预贡院之选皆非有所期望又不曾足蹶贵人之门惟以乡邦此事久为阙典自创州以来至于今五百余年未遇一贤刺史觉其然而整顿之今幸遇君侯负高明正大之才秉高明正大之见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于此不为州闾出而一陈之则进为有隐于邦君之贤而失事机之口退为得罪于乡人子弟而抱无补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胜僭越皇汗之至。

《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一《道释门·约束》：“诸寺观田宅为官司所拘占者，听依本色别置，不得过元价”^①。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宁府开元禅寺戒坛记》：“夫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为美，而佛之庐几甲于天下”。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韩某记并书

《两浙金石志》卷七《正真院碑·增田纪实》：“龟峰主者于景定壬戌、癸亥（1262～1263）二年捐衣资开谷田，租计壹拾伍石有余”。

《江苏金石志》卷一七《光福寺公据》：嘉熙肆年（1240）该寺“于宝积院索到阴元舍田玖亩叁拾步，租米壹拾石元契乙纸”。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八，宝庆改元（1228）《重修卧龙寺记》：至道以后复修湖南沅江该寺，“厥后又以余力，置买第四都地名三姑托孟世兴、孟友勋、徐卿等田十亩，泊易这山柴山田地等，以贍山门，以传不朽”。

《金石续编》卷一七《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哲宗绍圣（1094～1098）中，山西寿阳方山该寺“开垦山田，建下庄院一所，岁收莽粟千斛”。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〇，崇宁元年（1102）刘渭《蓬莱山寿圣禅院记》：该永净主院事时，“既又辟田三百亩以贍二时之供羞，植松十万本以助众山之森秀，亦其徒慧初、义琛与夫郡豪吴君骥有力焉”。

《金石萃编》卷152，绍定六年（1233）七月《云盖龙寿禅寺复田记》：“寺兴于唐天复中，钟传据豫章日奏置，以处光化禅师，官给田三千顷。……（其后）虽在籍之田弃而不有，亦漫不复省。绍定壬辰连帅李公寿，朋因法席适虚闻僧祖开、道价，即具威仪迎致。……寺故有田滨樵口曰里湖，为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余亩。（李公）开命阅籍，果不诬。……尽理而归诸寺”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四《东谷无尽灯碑》：“佛弟子琴彦迁并妻钟氏三娘，谨施净财三十六贯文足，开田三亩，点卢舍那佛阁善知识前无尽灯乙碗功德，作来世之津

^① 燕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版。

梁，获它生之善报。……绍兴二十八（1158）年正月 日募缘直岁僧智宣立石”。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〇〇《西河新修普济寺记》：“大观己丑（1109）有诏毁天下寺之无名额者”。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九《保宁等寺牒并使县帖》：“中书门下牒京兆府。京兆府奏：准敕分析所管存留有无名额僧尼寺院共陆拾壹所。伍拾柒所并名名胜任额。数内兴平县肆所并无额。……

牒奉敕处分析到先存留无名额寺院等。……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使帖。

《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八·黄震传》：宝祐四年登进士第“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

《成都方类》卷三九，政和七年（1117）楊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記》：建隆中王师西征，蜀之君臣讐天威不违咫尺，自知灵诛之不可追也，惶怖稽首，愿奉土地以献，举其柰入受廛比编氓，有诏俞许。命诸将振旅，独以降王北还。……时伪节度使田钦全与其夫人郭氏谋所以饰喜而效报者，尽捐所有土田施诸正法寺。……以今量法步之，周袤度可为田万亩以上，然其中颇包屋庐、坟墓、道涂、笏竹之埧沟涧之塍、多寡乘除，率十数实得七八。田、郭既还朝，受宅里于王府，大过望，辄以前日舍田状闻诸公，丐下府县订正畛入付寺僧为久远据。……升平寢久，生齿渐繁，人弃刀剑市钱铸，相与垦田修穡事，以故曩时瓴甓之区茆在草者类，泽泽就开凿，初得新田三千七百七十三亩。而佃畹之老身长子者，妄主名窃有之，而府县核实乃获隶寺，然地之未入者参半弗翅。自庆历距元丰执耜日以众，辟壤日以广，盖又得美田四千七百七十三亩，而旁近计伍，侵蚀如故，调加巧焉。寺僧稍欲检察，则其徒辄手棘待诸涂，往往相搥击濒死。府县病之，上下合谋，以为此弊之滋岁久不可亟正，姑归县官可弭讎讼，因两置枉直不竟，第籍入之。众遂噤塞舍去。独长僧德信奋曰：理固有在，物固有归，在公即输之公，在私宜还之私，何得愤愤若此，遽挟故图，辑破券，走三千里赴于都下，事付府县，仍格不行。寺众疑怠，诿曰，已矣，亡可为者。信犹不变。攘袂言曰。是故我图券中物。我当以死争，田若不归，义不生还。……太师、鲁国公适秉笔，见而哀之曰：咄！汝毋若是，田之籍于官其与几何，惟田郭葵藿之愿有不可逆尔，衲子精卫之志有不可夺，吾为汝直之。翌日言于上，悉以田归寺。……凡田之被旨乃崇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其复之寺，乃崇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综之新旧田合八千五百四十六亩有畸，而记之成，寔政和七年四月初三日也。……凡田之赋役，公有版籍。凡租之出纳，寺有簿领。不必复记，可按而知也。……”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五《祠祀志·天庆观》：“本朝大中祥符间赐额，改为祥符宫，续又改为天庆观。……绍兴十七年留守晁公谦之请于朝重建之。……淳佑初，留守别公之杰倡诸司捐金粟重修之太学正章公权为之记

记云汉兴三世，至于孝文好道家之学，躬修玄默而清净之化流，我真宗皇帝绍修圣绪，以时考之，亦汉文时也。意将不言而化，行无为而事治，乃大兴道教，诏诸路军州各建天庆观。至于或因或革，或狭或广，其土木费用或一出科降，或兼资施舍，则不能概同。

金陵之天庆盖晋冶城故地，楊氏之吴建為紫極宮，籍田二十頃在常之晉陵無錫間。暨為天慶，田亦因之，熙寧間始勅免稅役。

增补资料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九《泰州石庄明僖禅院记》：“石庄在如皋南九十里，大江之濒，空荒穷僻之处也。有明僖禅院者，靖康间所赐名，火败水啮，故墟为江。绍兴中，或撤江之中流摩河山之废佛殿徙置今所，稍屋其旁，残僧守之，陋且益褻，主僧至者搜拾囊橐，无何弃去，前后相踵。淳熙十年（1183），蜀简州僧希问至，笑曰：吾无待于寺，而寺乃有待于我，殆命然耶。则悉捐衣赀，敛财募工，累积毫芒，寝庐靚深，斋堂明宽，重门外严别殿，旁峙栖钟之楼舍，客之室庑庖，湢具体不侈，为之五年，无不如志，环松柏数千，郁然以茂。以其余力市田十顷，筑室营稼，贮缗钱数百，贸易诸物，其徒日增，而用日饶。又曰：江水益荡而北，异日复啮吾寺。则买高燥田三十亩于他所，亦艺木环之，备徙筑焉。

宋邵伯温《闻见录》卷一六：“皇佑（1049～1054）初，洛阳南资福院有僧录义琛者，素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自平凉帅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过洛，义琛见之曰：乡里门徒数人，欲一望见龙图。有顷，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义琛已密约贷钱为师鲁买洛城南宫南村负郭美田三十顷。师鲁初不知，后义琛复以岁所得地利偿诸人。至师鲁卒，丧归洛，义琛哭柩前，纳其券于师鲁家。师鲁素贫，子孙赖以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四〇《新復報恩善生院記》（省齋文稿四〇）：“庐陵郡西南六十里，古有报恩善生精舍。其废已久。政和（1111～1118）中，寶严院僧永韶始命其徒宗式乞故额而兴复之。人皆曰是不可为也。宗式曰：我必成之，顾旧基濒溪，将为水坏。宣和辛丑（1121）别卜大冈之趾迁焉。其地盖永韶族父刘臻业也。既得之，则悉力营度，一年而寢室成，二年而法堂立。……（求周必大为《记》）予曰：昔人论为政之蠹，释老常居其一。今竭中人几家之产，而成尔数十之居。为吾儒者，方且膺之，又何记焉。宗式曰：“不然。古用普度之制，闲民无常职，多寓名于帐籍。幸国大庆，例得黄其冠，缙其衣，动以千万计，而试经若恩泽不与焉。故丁壮日耗，害一也；寺观占田无艺，富则千蹊百辙，规免徭役，故民产又耗，害二也。今固异此，输金于官，乃度以牒，其利一；常产圭黍不可增，而州县科调时仰给焉，其利二。去二害，得二利，果可同日而语哉！……淳熙元年岁次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青原野夫周某记。”（宗式修院后54年记）

宋林表民编《赤城集》卷六，董亨复《州学增高涂田记》：“儒宫之养，养有用也。佛氏之养，养无用也。有用之养常薄，无用之养常丰。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无用于世，儒又有功于佛，因彼之丰，助吾之薄，理亦宜尔。先是，台之亡僧有新围高潮涂田。前太守、今尚书赵公必愿以其半与学，簣窗记之矣。报恩寺争之不胜，思以计取。阳为租佃，岁输不能厘杪，阴实据之。既郡委官履之，而周知其数，为田五百二十二亩有奇。地已垦者一百二十亩而缩，未垦者二百四十亩而赢，潞水之所一百三十七亩有半，斯亦广袤矣。而涂之增者，日未已也。然与养济均分，学不能专而有，故僧抢臂于其间。今太守赵公因博士杨君点之请，尽挈而归之学，别辍廩余以惠贫民，然后学总其权，而利入丰矣。……赵君名与杰南丰人淳佑二年四月日记

豪右占湖田：宋卫泾《后乐集》卷一五《郑提举札》：“某寓居江湖间，自晓事以

来每见陂湖之利，为豪强所擅，农人被害无所赴诉。淀山一湖，广袤四十里，泽被三郡，沿湖民田百年无水旱之患。……数十年来，湖之围为田者，大半皆出豪右之家。旱则独据上流，沿湖之田无所灌溉，水则惟知通放，湖田以民田为壑，兼湖水既不通，浊潮贮渟，通湖水道浦溆皆为之湮塞，江湖既隔绝，旱无所灌溉，水无所通泄，旁湖被江民田无虑数千顷反为不耕之地，细民不能自伸，抑郁受弊而已。……见者绍熙（1190～1194）初，忽为中天竺寺挟巨援，指间使司吏辈，并缘为奸，子宜徐丈，亦不深究，遽尔给佃，因民词，再得费开掘，事虽施行，缘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无所忌惮，今春复有顽民数辈，约从毁撤向来禁约石碑，公然围筑，稍孰何之者，辄持刃相向。

宋卫泾《后乐集》卷十三《论围田札子》臣闻饥穰之数在岁有时在人有地利天时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废修亦不容无责焉切见承平之时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其大半中兴以来浙西遂为畿甸尤所仰给旁及他路盖平畴沃壤绵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虽少有水旱不能为灾自豪右兼并之家既众始借垦辟之说并吞包占创置围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浅水犹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无口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观之似若无用由农事言之则为甚急江湖深广则蓄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资灌溉或狭隘则容受必少水则易溢未免泛滥之忧旱则易涸立见焦枯之患事理晓然州县之官皆可以举职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势足以陵驾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谁何浸淫滋广江湖之利日朘月削无复曩时之旧围田增租所入有口而平岁倍收之田一罹旱涝反为不耕之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农人失业襁负流离其害又岂特在民而已矧惟国朝成宪应山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泺与众共者不得禁止及请佃承买官司常切觉察如许请佃承买并犯人纠劾以闻及渚水之地辄许人请佃承买并请佃承买人各以违制论立法之意可谓明白前者臣僚累尝奏请朝廷非不施行凡系积水草荡今后并不许请佃虽陈乞拨赐亦许守臣执奏此干道五年九月指挥也差官检视应停蓄水河道有湮塞壅遏去处照旧来界至悉行开掘仍每岁巡察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挥也令浙西诸郡约束属县如有给据官民户买佃江湖草荡围筑田畝许人户越诉置之重宪仍委监司纠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挥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后尚复围裹断然开掘犯者论如法给据与不告捕者并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挥也是皆匾榜大书人所共覩其它藏于案牒者当不止此奈何条画虽备奉行不口或易名而请佃或已开而复围或谓既成之业难于破壊或谓垂熟之时不可毁撤是知千百畝之田为可惜而不知百万畝之田尤可惜不忍强横之一夫而忍于贫弱之百姓上泽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则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爱口根本访民疾苦诏口屡颁不为虚文如以臣言为然乞赐睿断行下户部检坐条法及累降指挥申严要束本路监司州县常令遵守仍委御史台觉察法不徒立务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择幸甚贴黄臣所奏围田止为妨民水利抑又有可虑者凡围田去处多在荒僻之乡必立庄舍佃户聚居既广行包占又欲侵夺侧近民产多蓄无赖恶少及刑余罪人号为佃户实是奸民幸遇丰年粗得无事岁收稍不能给数十为羣江湖商贾村野居民即被剽掠甚至杀伤间或败露在官具有案牒可考切恐饥荒之岁遂为渊薮若行禁戢奸民无所聚集亦潜消盗贼之一口伏乞睿照

又，臣尝考国家承平之时京师漕米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兴以来浙西遂为畿甸尤所仰给岁获丰稔沾及旁路盖平畴沃壤绵亘阡陌有江湖渚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势高下相类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渚泄两得其便故无水旱之忧而皆膏腴之地自绍兴末年始因军中侵夺濒湖水荡工力易办创置堤堰号为坝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犹未至甚者渚水之地尚多也隆兴干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

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徧满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观之似若无用由农事言则为甚急陂湖广衍则渚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则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滥事之利害岂不较然易知州县监司所当禁戢然围田者无非形势之家其语言气力足以陵驾官府而在位者每重举事而乐因循故上下相口恬不知怪而围田之害深矣议者又曰围田既广则增租亦多其于邦计不为无补殊不思缘江并湖民间良田何啻数千百顷皆异时之无水旱者围田一兴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逮至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设若围田侥幸一稔增租所入有几而常岁倍收之田少有水旱反为荒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所谓增租既不系省额州县得以移用徒资贪黷之吏耳此其轻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后辨也矧惟祖宗成宪炳若日星应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泺与众共者不许占据及请佃承买官司纠劾以闻诸渚水之地为众共溉田者辄许人请佃承买并请佃承买人各以违制论立法之意可谓明白前者臣寮累奏请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诸路如有承买渚水地者悉与改正此绍兴二十八年指挥也凡系积水草荡今后并不许请佃虽陈乞拨赐亦许守臣执奏此干道五年九月指挥也诏两浙漕臣及提举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觉察如官民户及寺观围筑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闻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挥也诏州县辄敢给据与官民户及寺观买佃江湖草荡许人户越诉重寘典宪仍委监司纠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挥也诏浙西诸郡应官民户旧来围田去处明立标记给榜晓谕不得于标记外再有围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挥也其它条约未易悉数夫以陈说之众多立法之详备是宜围田之害悉绝而渚泄之利尽复曩时之旧可也然历年浸久陂湖之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围者牵于姑息固不复论标记之外增创围裹者有之因民词诉已毁撤而复修筑者有之易名为天荒田而请求给佃者有之寺观僧道尤无忌惮是岂不可禁戢哉吏治苟简而法令不行之过也积习而不知变奸猾口利农夫失业其害又岂特在民而已臣伏见干道间孝宗皇帝一日宣论辅臣曰闻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屡有人理口多为权势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视有张子盖围田九千余畝湮塞水势立命开掘仍戒勅不得再犯淳熙中因姚述尧言传法寺僧请佃明州定海县鳳栖沉窖两湖八百畝可溉田二万六千余畝即令仍废为湖英断如此孰不悚惧其奉行不口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则有所赴愬矣。臣仰惟陛下恭俭爱民，率绳祖武，诏令之下，不为虚文，如以臣言为然，乞赐睿旨行下户部检坐条法。及累降指挥，申严约束，断自今以后，凡陂湖草荡，并不许官民户及寺观请佃围裹，如辄敢干求，陈诉者具名奏闻，寘之于罪，本路监司州县常切遵守，或有违戾，委御史台弹治，庶几法不徒立，豪强戢敛，农民安于农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说也。惟陛下留神，幸甚！续奉圣旨依。